



張蕙慧

著

嵇康音樂美學思想探究

文津出版社印行
文史哲大系一一五



B235.35
2000/

港台書室

文史哲大系 115
張蕙 著

嵇康音樂美學思想探究



文津出版社 印行



00819295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嵇康音樂美學思想探究 / 張蕙慧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文津, 1997[民86]
面 ; 公分. -- (文史哲大系 ; 115)
參考書目:面
ISBN 957-668-427-7(平裝)

1. (三國)嵇康 - 學術思想 - 哲學

123.14

86003890

文 史 哲 大 系 ①⑤

嵇康音樂美學思想探究

著 作 者 : 張 蕙 慧
發 行 者 : 邱 家 敬
出 版 者 : 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 址 : 臺北市106建國南路二段294巷1號
電 話 : (02)3636464 傳真 : (02)3635439
郵政劃撥 : 00160840 (文津出版社帳戶)
登記證 : 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第5820號

初版 : 公元1997年4月一刷

新台幣 230 元

ISBN 957-668-427-7

自序

在拙著《中國古代樂教思想論集》脫稿之後不久，我很快就鎖定嵇康音樂美學作為下一個研究目標，想不到爲了圓這個夢，竟然花費了數年的時間。

嵇康的音樂美學在沈寂千餘年後，驟然成爲當代學術界的寵兒，研究文學、哲學、美學、音樂思想的人都注意到他，師心獨見的理論，《聲無哀樂論》與《樂記》、《溪山琴況》並稱三大音樂美學名著的評價，都使他成爲學術星空的天鵝座。找到他當作研究的對象並不困難，真正困難的是：如何去吸收消化他那艱深冷僻的文本，如何去融會貫通那麼多時賢的研究成果。尤其是我過去所研究的孔子、荀子、《樂記》等傳統樂論和他的觀點處於針鋒相對的狀態，持理若衡，不偏不倚，對我而言才是最大的考驗。

時下海峽兩岸研究嵇康音樂美學的專著及學位論文已有好幾本，單篇論文及散見於文學、哲學、美學、音樂思想等專書中的篇章更不知凡幾。爲了希望能夠在質與量兩方面都能夠有所突破，我不能不特別努力。就量而言，扣除附錄，全書約十五萬言，在厚度方面較之同類著作已毫無愧色。就質而言，我希望在廣度、高度、深度、密度各方面都不要讓讀者失望。書中有許多篇幅以採花釀蜜的方式，在綜合時賢的研究成果之餘，也不時提出個人的淺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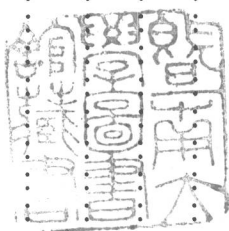
至少有三分之一的章節是時賢未曾探討或甚少著墨的死角，寫起來就更加費力。幾年下來，雖說眼前始終有一個理想在誘使我不斷前進，但究竟做到多少，則要仰賴讀者的明察與指教了。

最後，要感謝時賢豐碩的研究成果，使我在寫作過程中能左右逢源；使我能夠站在他人的肩膀上續求精進。也要感謝外子雅州的全力協助，從蒐集資料、商榷體例、討論內容到潤飾文字，他都費心不少。當然，繼《中國古代樂教思想論集》之後，文津出版社邱鎮京教授再度慨然答應為我出版這樣一本純學術的冷門書，也是應該在此說一聲謝謝。

八十六年元月張蕙慧謹識於臺北

嵇康音樂美學思想探究 目 錄

自序		〇一
第一章 緒論		一
第一節 嵇康的時代背景		一
第二節 嵇康的生平及著述		六
第三節 嵇康的思想		一三
第四節 嵇康的音樂造詣		二一
第二章 嵇康音樂美學思想的文獻		三〇
第一節 基本文獻的分段大意		三〇
第二節 基本文獻的寫作技巧		三九
第三節 基本文獻的研究成果		四五
第三章 嵇康音樂美學思想的要旨		六四



第一節	音樂的本質	六四
第二節	音樂與情感的關係	七三
第三節	音樂的審美	八二
第四節	音樂的功用	九一
第四章	嵇康音樂美學思想的淵源	一〇九
第一節	前賢的啓示	一〇九
第二節	時代的激盪	一二一
第三節	自身的創發	一二五
第五章	嵇康音樂美學思想的比較	一三二
第一節	嵇康與樂記音樂美學思想的比較	一三二
第二節	嵇康與阮籍音樂美學思想的比較	一五五
第三節	嵇康與漢斯立克音樂美學思想的比較	一六五
第六章	嵇康音樂美學思想的評論	一八七
第一節	嵇康音樂美學思想的貢獻	一八七
第二節	嵇康音樂美學思想的商榷	一九六

第三節	嵇康音樂美學思想的補苴	二〇五
第七章	嵇康音樂美學思想的影響	二二一
第一節	音樂方面的影響	二二一
第二節	其他方面的影響	二二八
第八章	結 論	二三五
附錄	聲無哀樂論	二三八
	琴賦並序	二五〇
參考書目		二五六

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嵇康的時代背景

任何一個人都無法遺世而獨立，任何一個理論家、創作家必然會受到時代與環境的影響。我們要了解嵇康的音樂思想就必須先了解嵇康其人及其思想；要了解嵇康其人及其思想，就必須先認識嵇康的時代背景，這就是孟子所謂的「知人論世」。所以，首先讓我們來探討嵇康的時代背景：

一、政局動盪

嵇康（西元二二四—二六三年）生於三國時代的北方（註一），當時天下承東漢末年四海鼎沸、軍閥割據的餘波，雖然鼎立之勢已成，但動亂的局勢並未歇止。即以北方的曹魏而言，外則與吳、蜀紛爭不斷，還加上鮮卑寇邊、攻遼東、伐高句麗，可謂征戰連年；內則有曹爽之難、司馬懿父子專權，王凌、李豐、毋丘儉、諸葛誕等先後兵變，使得政局更加不安。戰爭屠殺的結果，相隨而來的自然是政風敗壞，災疫流行，人民播遷，經濟破產，民生疾苦。

根據統計，東漢桓帝永壽二年（西元一五六年），全國人口五千零六萬，為東漢人口最多時期。魏元帝景元四年（西元二六三年），魏滅蜀時，魏的人口為四百二十九萬，蜀為一百零八萬。晉武帝太康元年（西元二八〇年），晉平吳時，吳的人口為二百五十六萬人（註二），以此估計，嵇康的時代，全中國人口不過八百萬人左右，與東漢桓帝時相較，短短百餘年間，銳減六分之五以上，真是令人怵目驚心，當時政局動盪之激烈，由此可見一斑。

二、環境險惡

在動盪不安的環境中，司馬懿父子為了遂行奪權的野心，展開一連串的政治鬥爭，人民的生命財產毫無保障固不待言，即使貴為帝王，也隨時有遭黜被殺的可能。而處境最為艱難的應數知識份子，在那種黨派對立，篡奪相踵的局面下，真是動輒得咎，命如雞犬。如齊王芳正始十年（西元二四九年），司馬懿發動高平陵之變（註三），誅殺權臣曹爽，死難者超過萬人，以何晏、丁謐、鄧颺為首的清談派當權者幾乎全被消滅。其後的幾次兵變，士人遇害的也為數不少。宜乎當時的知識份子人人自危，或隱居田園，或寄情山水，或談玄說理，或沈湎酒色，或裝聾作啞，為的只是避禍全身而已。可是連「二十年未嘗見喜慍之色」的嵇康最後竟然也難逃被殺的命運，當時環境之險惡，雖在千載之下還是會令人不寒而慄。

三、禮教崩潰

東漢末年，社會騷亂，風俗衰敝，原本為學術重心的經學也因其本身日趨繁瑣、支離、迂腐而逐漸喪失中流砥柱的作用。董卓舉兵所引發的一連串變亂，把長安、洛陽兩個文化古都破壞殆盡，儒學、典籍都遭到空前的浩劫。曹操嚴刑峻法的政策，用人唯才，不計品德的求賢令，更無情踐踏了儒家的禮樂教化，瓦解了人們心中的精神寄託。司馬氏表面上雖標榜禮法之治，實則藉經學名教和禮法為政治上宰制他人的工具，如誅殺曹爽等八族，鎮壓王凌、毋丘儉、諸葛誕等所謂「淮南三叛」，都是冠以「不忠」的罪名，廢齊王曹芳、弑高貴鄉公曹髦，則加上「不孝」的罪名。一般的豪門世族如何會、荀顗之徒，雖然也滿口道德仁義，事實上則生活奢靡，唯利是圖，只是以孝悌忠信來掩飾其雞鳴狗盜的行徑而已。偽道德橫行肆虐之餘，真道德的防線當然更是徹底崩潰。如果我們了解這個背景，那麼對於嵇康之主張越名教而任自然、非湯武而薄周孔，也就不足為奇了。

四、思想開放

三國時代，無論政治的壓迫，道德的束縛，人性的摧殘都已經到了極點，忍無可忍的人們，既無力改變黑暗殘酷的現實，只有消極地逃避到另一個玄虛的理想國，而老子之清靜無為、莊子的逍遙齊物、楊朱的個人主義、列子的厭世思想，這些道家的學說正足以滿足人們的需求。這時統治者一方面為了籠絡人心而放鬆思想管制，一方面因全神貫注於政權的保持，無暇顧及其他，所以衰世之書的《老子》、《莊子》就逐漸取代儒家經典，成為當時的顯學。

道家認為道德、知識等一切人爲的產物都是虛偽的桎梏，必須徹底予以揚棄，才能回歸到自然的境界，享受優游的人生。這種充滿浪漫精神的自然主義思潮，使得知識份子從拘迂的經學、僵化的禮教、迷信的宗教中解放出來，也使得三國時代，無論在學術研究、文藝創作、人生倫理各方面都呈現一種全新的面貌。只有在思想那樣開放的時代，知識份子的任何思想和見解才有可能隨時提出來討論，也最容易產生新學說、新理論。嵇康獨樹一幟的聲無哀樂論就是這樣應運而生的。

五、清談興盛

如果說經學是漢代學術的主流，佛學是隋唐學術的中堅，理學是宋明學術的重鎮，樸學是清代學術的特色，那麼玄學就是魏晉學術的代表了。玄學和清談是一體的兩面，早在漢末，高人逸士郭泰、許劭已開清談的先聲，他們喜歡品評古代或鄉黨的人物，來發洩自己的苦悶與牢騷，卻絕口不提當時的政事，以免遭致殺身之禍。到了魏初，經過荀彧、何晏、王弼的鼓吹，清談更蔚為風氣，這時，環境更加險惡，而且老莊思想也十分流行，所以當時的名士，無不是以清妙的語辭，論難的方式來追求形而上的哲理。《周易》、《老子》、《莊子》這三本書成爲他們的最愛（註四）；無爲、無名、逍遙、齊物這些名詞成爲他們的口頭禪。在曹魏時代，最有名的清談家除了何晏、王弼之外，就要數竹林七賢了，而稽康正是七賢中的重要人物。清談家最喜歡談的「玄學三理」（註五），有的是創始於嵇康，有的是到了稽康

才得到充分的開展，則嵇康在清談中的地位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

六、文藝獨立

儒學獨尊的漢代，一切以倫理道德為標準，這本來不是壞事，但是到了末流，弊端所積，卻嚴重妨礙了文學藝術的發展，如賦成為歌功頌德的傀儡，詩成為諷諫教化的工具，畫成為以線條為主的裝飾品，音樂舞蹈只供宮廷權貴的玩樂，書法也流於板重嚴肅。幸而魏晉之際，老莊的玄妙神秘的色彩，玄學的自然放任的精神，為文學藝術注入了新的活力，使文藝界趁著自由解放的機會，得以從個人主義出發，特別注意到對情性生命的關注，儘量去尋求新的題材，創造新的形式，建立新的理論。曹丕的〈典論論文〉擺脫了儒家原道宗經的觀念，只重視文學作品的個性與氣勢，是第一面揭起文學獨立的大旗。嵇康的〈聲無哀樂論〉特別強調審美情感的主體性和自由性，也否定了傳統音樂的功能與目的。從此以後，無論詩辭、歌賦、書法、繪畫、音樂、雕塑都向著自由開放的方向力求發展，而展現出更多的審美性、藝術性與純粹性，不再是政治宣傳、道德教化的僕傭，也不再是統治者玩樂的工具。宗白華說魏晉南北朝是一個強烈、矛盾、熱情、濃於生命色彩的時代，使我們聯想到西洋十六世紀的文藝復興（註六）；葉朗也說魏晉南北朝是中國美學史上的第二個黃金時代（註七）。他們的說法實在都是很有道理的。

第二節 嵇康的生平及著述

一、生平

嵇康，字叔夜，約生於三國時代魏文帝黃初五年（西元二二四年），卒於魏元帝景元四年（西元二六三年），得年四十。（註八）

他的祖先本姓奚，祖籍在會稽上虞（今浙江紹興），爲了躲避仇怨，遷到譙國銍縣（今安徽宿縣），同時指山爲姓，改姓嵇，表示不忘會稽之意（註九）。

父親名昭，字子遠，曾任治書侍御史（六品），很早就逝世了。嵇康完全是依賴母親和長兄撫養，才得以長大的（註一〇）。可能是過分溺愛，從小便有些懶散任性，有時半個月都不肯洗頭、洗臉呢！不過，生來聰明伶俐，雖然沒有名師指點，倒也能博覽群書，無所不通。年輕時，接受儒家教育，對於親情特別重視，後來改學老、莊，又有抗心希古、守樸全真的傾向，這兩大學派對他都具有很大的影響力。

嵇康不僅才氣高，學問好，而且身高七尺八寸（約一八八公分），相貌不凡，風度翩翩，所以被選爲長樂亭主婿。長樂亭主是沛王曹林的孫女，嵇康乃一躍而爲皇親國戚，同時也成爲正始玄學領袖何晏的姻親晚輩（註一一）。不過，他卻只被選爲郎中（八品），遷中散大

夫（七品），時間不長，而且都是冗散閒官，並沒有權勢可言。不慕榮利的他倒也不在乎這些，不料這項婚姻，對於嵇康的未來命運，卻成爲一個重要的關鍵。

這時，年幼的齊王曹芳在位，朝政由大將軍曹爽、太尉司馬懿共同輔佐。曹爽代表的是年輕的貴族子弟，具有改革的熱忱，生活卻驕奢淫佚；司馬懿代表的是資深的官僚體系，擁有既得的利益，手段相當靈活陰險。這兩個集團之間理念完全不同，利益經常衝突，自然無法攜手合作，爾虞我詐，鬥爭日趨白熱化。在這種形勢下，許多明哲保身的士人紛紛採取迴避的態度。嵇康也從京師洛陽隱退到山陽（河南修武），剛好阮籍、山濤、劉伶、阮咸、向秀、王戎六人都在那兒，於是七人常集於竹林之下，或痛快飲酒，或清談玄理，或聆賞琴曲，他們都嚮往老莊，蔑棄禮教，過著放浪形骸、韜光隱晦的生活，這就是有名的「竹林七賢」（註一二）。

果然，正始十年（西元二四九年）正月，老謀深算的司馬懿趁著曹爽等人陪同皇帝離開京師去祭掃高平陵（魏明帝墓）的機會，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發動政變。曹爽兄弟以及何晏、鄧颺、丁謐等八族都慘遭屠戮，以正始名士爲核心的當權派爲之土崩瓦解，齊王芳旋即改元嘉平。此後，曹魏王朝的支持者如王凌（西元二五一年）、李豐（西元二五四年）、毋丘儉（西元二五五年）、諸葛誕（西元二五七年），雖曾接二連三發動兵變，企圖扭轉局勢，但每次都慘遭失敗。連皇帝的命運也掌握在司馬氏父子的手中，如西元二五四年司馬師廢齊王

曹芳，立高貴鄉公曹髦，西元二六年司馬昭弑高貴鄉公，立陳留王曹奐（即魏元帝）。所以，從高平陵之變後，十餘年間，表面上雖是曹魏的天下，實際上則是司馬氏在掌握大權。咸寧二年（西元二六五年），司馬炎篡位，不過是使名與實相符的手續而已。

司馬氏集團在掌權之後，除了以血腥手段鎮壓反對勢力外，對知識份子也極盡威脅利誘之能事。一方面以高官厚祿來收降名士，一方面以禮法名教來排除異己。嘉平四年（西元二五二年）之後，山濤、王戎、阮籍等人先後被迫出仕，只有孤高的嵇康仍然以隱居的方式作消極的抵制。這時，與嵇康較有交情的，只有向秀、孫登、呂安、趙至、袁準、郭遐周、郭遐叔、張遼叔、阮德如等寥寥數人而已。活動的範圍不過是山陽、洛邑、河東（山西夏縣北）、潁川（河南禹縣）、汲縣（河南汲縣）等地區。他平日除了與朋友遨遊外，就是上山採藥、飲酒爲文、澆灌園圃、寄情書畫，而最喜歡的則是鍛鐵與彈琴，大概這兩項最能宣洩他的苦悶，舒發他的情感吧！

嵇康雖然不求聞達，但他的風度、人格和才華還是引起許多人的仰慕，如呂安遠居在山東東平，但每當想念嵇康時，就不惜千里迢迢地跑到山陽來看他，又如司馬氏的親信鍾會寫了一篇〈四本論〉，想要得到嵇康的推獎，又怕碰釘子，只好偷偷把文章從窗外丟進去，就匆匆忙忙跑掉了。

才儁而性烈的嵇康，思想和行爲都表現得十分矛盾，一方面，他優游世外，隱居不仕，

二十年未嘗表現喜慍之色；一方面，他剛烈的個性又使他忍不住遇事便發。如高貴鄉公正元二年（西元二五五年）鎮東將軍毋丘儉因齊王芳被廢而起兵淮南，爲司馬師弭平，嵇康卻寫了一篇〈管蔡論〉爲毋丘儉辨誣，暗中諷刺司馬氏兄弟是亂臣賊子（註一三）。又如司馬昭利用吏部郎山濤誘使嵇康到他的幕下，嵇康卻寫了一篇〈與山巨源絕交書〉，表明自己不願爲官的理由「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其中有「非湯武而薄周孔」之語，對司馬昭虛偽的名教也有所影射攻擊。又有一次，恃寵而貴的鍾會去拜訪嵇康，嵇康卻箕踞鍛鐵，對他不理不睬。臨去，嵇康問他：「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鍾會答說：「有所聞而來，有所見而去。」諸如此類行爲，都使得本來就對其皇親國戚的身分十分側目的司馬氏集團更恨之入骨，而爲他埋下了殺身之禍的種子。

魏元帝景元二年（西元二六一年）呂巽玷污了呂安的妻子，其弟呂安本擬報官訴訟，經過嵇康的調解，事情才暫平息。不料呂巽恐怕醜聞外洩，反而誣告呂安不孝，呂安因此被判充軍，次年召還洛陽，關進獄中。嵇康獲悉消息後，十分震怒，馬上寫信責備呂巽，同時挺身而出，爲呂安辯護。當時呂巽擔任相國掾，這件事立即引起司馬昭與鍾會的注意，鍾會認爲報仇的機會來了，他對司馬昭進讒言說：「嵇康，臥龍也，不可起。公無憂天下，顧以康爲慮也。」又誹謗嵇康有意助毋丘儉起兵而被山濤勸止，最後建議：「康、安等言論放蕩，非毀典謨，帝王者所不宜容，宜因衅除之，以淳風俗。」（註一四）這些話正中司馬昭下懷，